

创业营商环境、市场准入与企业长期生存^{*}

朱奕蒙 徐现祥

内容提要:随着市场准入门槛的不断降低,我国企业的存活时间出现了结构性分化,企业的长期生存已成为关乎经济韧性的重要现实问题。根据企业动态演化理论,减少准入审批将对企业生存能力产生长期影响,该影响在“市场选择”和“企业选择”观点下存在差异。实证上,本文整理了国务院分批次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并使用生存分析法结合APC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企业成立时累计取消的准入类审批越多,企业的长期生存能力越强。该现象和机制检验结果均印证了“市场选择”观点,即减少准入审批通过降低进入成本提高了新企业的初始生产率,该生产率优势存在持续性,从而对企业生存产生正向的长期影响。

关键词:创业营商环境 准入审批 企业生存 企业动态演化

作者简介:朱奕蒙,佛山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528225;

徐现祥(通讯作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510275。

中图分类号: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5)09-0156-17

一、引言

企业的持续经营是保持宏观经济韧性、稳定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而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商事制度改革,随着市场准入门槛的不断降低,我国的市场主体数量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些企业在进入市场后的持续生存自然也成为一個更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直觉上,市场准入门槛下降可能会容纳更多质量较低、生存能力较弱的企业进入市场。已有研究发现,商事制度改革后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规模较小、退出率较高(毕青苗等,2024)。当然,大量新企业进入引发的激烈竞争也威胁着在位企业的生存。上述看法主要是在静态视角下关注改革的短期效应,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后企业的长期发展状况究竟如何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信息技术驱动的我国营商环境优化研究”(20&ZD07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行政审批改革对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的长期影响:基于企业动态演化框架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7210321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放管服改革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关联视角”(GD23CYJ10)。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徐现祥电子邮箱:lnsxuxx@mail.sysu.edu.cn。

图1呈现了不同年份成立的企业在不同注销年限上的比值变化。可以发现,相较于2001年及以前成立的企业而言,在2002—2004年成立的企业中,成立1年及以下注销的企业数量相对比值^①迅速上升,该时间段正值各地密集成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和各行业大量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改革高峰期。与前文的直觉和文献发现一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使更多企业在成立当年或1年内退出了市场。然而,成立5年及以上注销的企业数量相对比值也在该时间段平稳上升,这意味着同期有更多企业跨越了2~4年的生存瓶颈期,其存活时间超过5年。在改革高峰期后成立的企业中,存活时间超过5年的企业数量相对比值甚至明显加速上升。总体来看,伴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新成立企业的短期退出率有所提高,但长期生存能力也越来越强,似乎呈现与企业成立时期相关的“代际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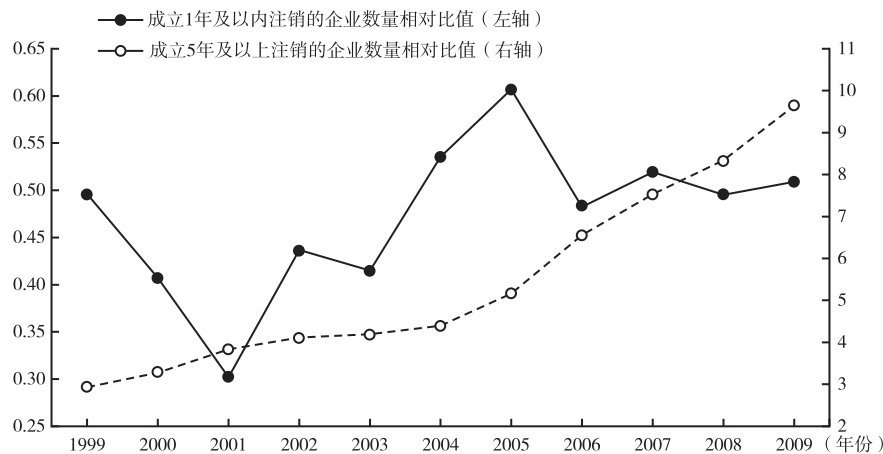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年份成立的企业在不同注销年限上的比值变化

注:使用企业成立年份和注销年份计算企业注销年限,根据企业成立年份和注销年限分别计算企业总数量,再进一步计算图中的比值。横轴对应企业成立年份。

资料来源:全国工商登记注册数据。

基于上述典型事实,本文聚焦企业成立当年累计取消的准入审批事项数量,考察创业营商环境对企业长期生存的影响,检验这一“代际效应”。然而,从实证上识别这样的长期影响存在两方面困难。一是度量创业营商环境。围绕本文所关注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现有文献均使用一个地区是否成立了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作为度量方式(夏杰长、刘诚,2017;毕青苗等,2018),然而服务中心带来的便利将贯穿企业整个生命周期,无法区分营商环境的影响来源于创业时还是企业成立后。二是识别长期影响。在企业成立后的每个时期,企业受到的影响均来源于创业时、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和当前所处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要识别创业营商环境的长期影响,就需要与后两种效应区分开。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在数据方面,本文通过整理和匹配政策文本构建了各行业取消准人类审批事项的数量,作为创业营商环境的度量指标。在识别方法上,本文以生存分析法为基础,借鉴“年龄-时期-代际模型”(Age-Period-Cohort, APC模型)的思路设计实证方程,从而对三种不同时间维度的效应进行区分。

^① 与成立后2~4年注销的企业数量求比值,以计算相对比值。不直接使用绝对比值的原因在于成立5年及以上注销的企业数量基数大、增速快,其他注销年限的企业数量变化趋势容易被掩盖。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有三类。第一类文献是关于企业生存影响因素的研究。这类文献大多聚焦当前的企业特征或外部环境,如企业年龄(Dunne等,1989)、创新研发(肖兴志等,2014)、银行救助(胡秋阳、李文芳,2023)等,其中也不乏关注营商环境的研究,如商事制度改革(毕青苗等,2024)、所得税优惠改革(林超等,2024)等,上述研究主要是在静态视角下关注当前营商环境对企业生存的短期影响。

第二类文献是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济绩效的研究。现有文献发现改革能够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夏杰长、刘诚,2017),或者通过实现跨部门协调促进企业进入(毕青苗等,2018),还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企业创新(王永进、冯笑,2018)、提升投资效率(王红建等,2020)等。在此基础上,部分文献注意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影响既可能发生在企业进入环节,也可能发生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朱光顺等,2020)。然而,现有文献中用于度量改革的指标均难以做到从实证上严格区分不同的效应。此外,上述研究关注的也主要是改革当期或短期的经济绩效。

第三类文献是关于创业环境长期影响的研究。长期以来,增长领域的文献一直在寻找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因素,其中短期波动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引发了许多讨论,越来越多的文献尝试在企业动态演化的分析框架下为此寻找微观层面的证据,研究了企业成立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成长(Moreira,2017;Sedlacek和Sterk,2017;朱奕蒙、徐现祥,2017)或企业生存(Geroski和Portugal,2010)的长期影响。总体来看,上述关注创业环境长期影响的研究均集中于经济视角。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无论是关注企业生存影响因素还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济绩效的文献,现有研究大多是在静态视角下聚焦短期或当期效应,而对长期效应的关注不足,本文将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视角从短期扩展至长期。第二,鉴于度量指标的局限性,现有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研究均难以从实证上严格区分改革在不同经济环节发挥的作用。相比之下,本文基于政策文本创新性地构建了能够清晰对应各类企业活动的改革度量指标,打开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黑箱”。第三,在动态视角下,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周期等创业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产生的长期影响,本文与之不同,关注创业时的营商环境,从制度视角扩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探索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性根源奠定了微观基础。

二、理论假说

在动态视角下,关注企业长期发展的研究通常基于企业动态演化理论(Firm Dynamics)。^①该理论揭示了企业的长期差异取决于两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一是企业在成立时形成的初始差异;二是初始差异在企业成立后的持续性。围绕这两方面原因,当前主要形成了两种关于企业演化的观点。“市场选择”观点认为企业的演化由生产率驱动(Hopenhayn,1992;Luttmer,2007),企业在成立时会形成生产率的初始差异,而资本的调整成本将导致生产率的差异持续存在,企业根据生产率水平做出扩大规模或退出市场等决策,即表现为生产率驱动了企业的长期演化。“企业选择”观

^① 作为一个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众多关注中国企业更替成长(Brandt等,2012;毛其淋、盛斌,2013)、资源错配(Hsieh和Klenow,2009)的经典文献中,该理论对中国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均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验证。

点则强调企业自身在成立时选择了不同的初始规模、产品类型等,此后这些方面的初始差异将在需求约束、声誉积累等机制的作用下具有不同的持续性,从而表现为对企业长期演化的影响(Atkeson等,2015)。

这两种观点均有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支撑。针对“市场选择”观点, Lee和Mukoyama(2015)从理论和实证上同时证明了在衰退时期进入市场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初始生产率,生产率的优势持续存在,从而进一步影响企业的长期动态演化。朱奕蒙和徐现祥(2017)也从实证上验证了经济衰退将“筛选”出生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进入市场,该初始生产率的优势持续存在,从而对企业成长产生持续的正向影响。针对“企业选择”观点, Moreira(2017)发现经济衰退时期进入市场的企业会以一个较小的初始规模进行生产,在顾客资本黏性的作用下,这些企业将在成立后持续面临市场需求方面的约束,并最终表现为企业规模长期持续偏小。Sedlacek和Stern(2017)则发现正向的需求冲击将使得企业在成立时有更强的动机选择建立一个生产“大众”产品(Mass Goods)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因其广泛的产品需求而具有更高的成长性,因而会在成立后持续保持更大的规模。也有研究同时支持这两种观点,如Gomis和Khatiwada(2017)发现,在发达国家,衰退期成立的企业雇佣人数更多、资本规模更大、生产率更高;而在发展中国家,繁荣期成立的企业资本规模更大、生产率更高,雇佣人数方面则没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将在企业成立后持续15年之久。

不难发现,创业环境如何影响企业的长期表现,关键在于其如何塑造了企业的重要初始特征以及该初始特征的差异是否存在持续性。

本文从取消企业准入审批事项的角度研究创业营商环境,现有文献通常将类似的制度环境变化看作市场进入成本的下降(Blanchard和Giavazzi,2003;Branstetter等,2014)。从“市场选择”观点来看,在以Hopenhayn(1992)、Melitz(2003)为代表的一般均衡模型中,企业的进入退出和成长衰退均由均衡条件下的生产率水平内生决定,而进入成本下降将使得该临界生产率水平提高。换言之,在较低的进入成本下成立的企业将具有更高的初始生产率,这一选择效应也有相应的经验证据支撑(Lee和Mukoyama,2015)。而从“企业选择”观点来看,进入成本下降对企业初始规模的作用恰恰相反,大多数理论和经验研究发现进入成本越低,新进入企业的规模越小(Klapper等,2006;Branstetter等,2014;毕青苗等,2024)。总之,进入成本下降可能通过“市场选择”效应提高新企业的初始生产率,也可能通过“企业选择”效应缩小新企业的初始规模。

前文的讨论已表明,在企业动态演化的过程中,生产率和规模的初始差异往往具有长期持续性,因此创业时的营商环境很可能对企业当前的生产率水平和规模大小产生长期影响。无论是初始时刻还是当前时刻的特征,生产率水平和规模大小都是决定企业生存能力的重要因素,(初始)生产率越高、(初始)规模越大的企业生存能力越强,这一结论在众多研究中均得到了稳健的验证(Agarwal和Audretsch,2001;毛其淋、盛斌,2013;卞元超、白俊红,2021)。基于以上逻辑推断,本文提出两个待检验的理论假说。

假说1:企业成立时取消的准入审批将影响企业的长期生存。

假说2:当取消准入审批通过“市场选择”效应提高了新企业的初始生产率时,创业营商环境将提升企业的长期生存能力;当取消准入审批通过“企业选择”效应缩小了新企业的初始规模时,创业营商环境将降低企业的长期生存能力。

三、识别策略

(一)生存分析法

本文使用的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5年),使用此类数据进行生存分析将面临数据删失的问题。一是由于无法观测到1998年以前企业的生存状况,因此使用该数据进行分析存在数据左删失的问题。为此,本文仅选取1998年及以后成立,且1999年首次出现在数据库中的企业作为样本,从而剔除左删失的观测值。二是由于企业数据截至2015年,对于当年仍然出现在数据库中的企业,无法观测其后续确切的退出时间和生存期限,因此数据也存在右删失的问题,需使用生存分析法来解决此问题。

在生存分析法中,许多研究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毛其淋、盛斌,2013;肖兴志等,2014),该模型能够有效解决数据右删失的问题,并且估计模型时不必假设基准风险的具体形式,从而避免了风险函数设定错误导致估计不一致的问题。然而,该模型要求风险率满足“比例风险”这一较为严格的条件,并且在使用年度数据时会出现生存时间“打结”的情况。因此,近年来更多文献使用离散时间生存模型研究年度数据(许家云、毛其淋,2016;卞元超、白俊红,2021;胡秋阳、李文芳,2023)。该模型不仅保留了Cox比例风险模型的一系列优点,还能有效处理生存时间“打结”和不满足“比例风险”假设等问题(Hess和Persson,2012)。

在离散时间生存模型中,令 T_i 表示企业 i 的持续生存时间,风险率 $h_i(j)$ 为企业 i 在第 $j-1$ 个时期存活而在第 j 个时期退出的概率($j=1,2,3,\dots$),即 $h_i(j)=Pr(j-1 < T_i \leq j | T_i > j-1)$ 。此时引入二元变量 y_{ik} ,该变量在生存时间停止于时期 k 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则以 y_{ik} 为二元因变量的对数似然函数可写为:

$$\ln L = \sum_{i=1}^n \sum_{k=1}^j [y_{ik} \ln h_{ik} + (1 - y_{ik}) \ln(1 - h_{ik})] \quad (1)$$

可以使用二元因变量的方法估计离散时间生存模型。通过分别假定 h_{ik} 服从极值分布、正态分布和logistic分布,上述估计分别对应cloglog模型、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使用文献中常见的cloglog模型,其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text{cloglog}[1 - h_i(j)] = \ln \{-\ln[1 - h_i(j)]\} = \gamma_j + X\theta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 γ_j 为企业 i 存活至第 j 个时期对应的基准风险, X 为一系列解释变量, ε 为误差项。

(二)识别长期影响

本文关注的长期影响来源于企业成立当年的创业营商环境。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任何一个时点的企业而言,有三种时间维度上的效应在同时影响企业:首先是本文所关注的来自企业成立时刻的影响;其次是企业自身发展阶段不同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是企业目前所处的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对这三种影响进行区分的思路类似于劳动经济学中的APC模型,该模型将个体差异的来源分解为年龄效应(Age Effect)、时期效应(Period Effect)和代际效应(Cohort Effect)。

理论上,可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同时引入企业年龄、当期年份和企业成立年份三种固定效应分别识别上述影响。然而,企业成立年份可由当期年份减去企业年龄计算得到,因此同时引入上述

三种固定效应会使得计量估计因完全共线的问题而无法识别。本文参照朱奕蒙和徐现祥(2017)的方法,以创业营商环境作为代际效应的代理变量,在生存分析模型式(2)的基础上引入企业成立时的创业营商环境 $entry$ 、年龄固定效应 Γ_a 和年份固定效应 Γ_t :

$$\text{cloglog}\left[1 - h_u(j)\right] = \alpha_0 + \alpha_1 \times entry + \gamma_j + \Gamma_a + \Gamma_t + X\theta + \varepsilon_{it} \tag{3}$$

其中,年龄固定效应 Γ_a 识别的是企业 i 当前的年龄 a 对生存风险的影响,年份固定效应 Γ_t 识别的是企业在当前年份 t 所处的外部环境对生存风险的影响,本文关注的系数 α_1 即代表企业成立当年的创业营商环境对企业生存风险的长期影响。

四、研究设计与企业生存特征

(一)度量创业营商环境

本文以企业成立当年累计取消的准入类行政审批事项数量(*deregulation*)度量创业营商环境,这一数据来源于对国务院政策文件的整理和匹配。自2001年9月全面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国务院分批次取消了大量行政审批事项,图2呈现了各批次文件的颁布时间以及该批次文件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数量。^①截至2015年11月,国务院累计取消行政审批事项2479项,并公布了各部门仍然保留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至此,约六成的审批事项已被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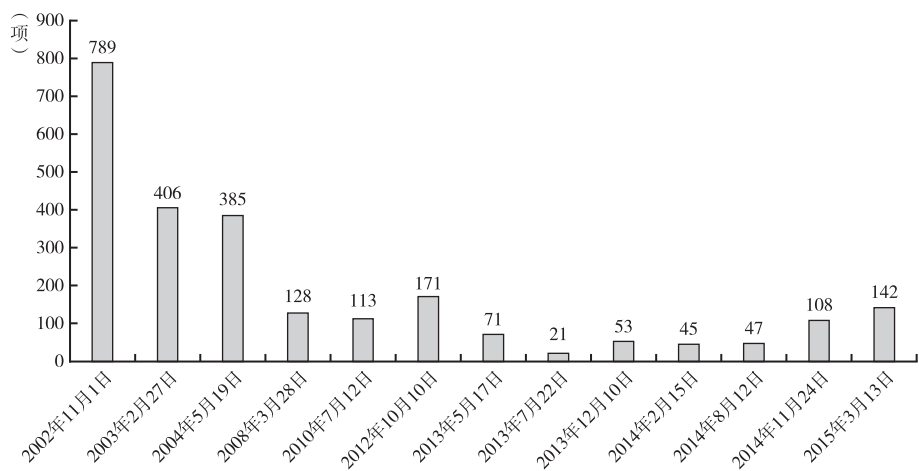


图2 各批次文件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数量

本文使用的行政审批事项数据即来源于对上述文本信息的整理和匹配,具体过程如下。

(1)整理准入类审批事项。文件中的行政审批事项不仅涉及企业活动,还涉及民生或社会活动,本文筛选出其中的涉企审批事项,根据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描述,将审批事项分为准入类审批和经营类审批两大类。本文所关注的准入类审批是指企业或其产品进入市场面临的审批事项,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开办企业的审批事项,包括企业成立(设立、开办等)和企业资格(资质、凭照等);二

① 不包含下放管理层级、改变管理方式、评比达标表彰、行政事业性收费、涉密事项等行政审批事项的调整。

是企业进行生产的审批事项,包括生产许可(许可证、准产证等)。^①

(2)匹配行业信息。参照国家统计局针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组织编写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本文将各项审批事项对应至所属的四位数行业中,由于该注释仅涉及行业范围描述和部分产品类型示例,难以与审批事项的描述直接对应,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大量文本同义词和近义词的比对。此外,有的审批事项针对的是行业目录(如高技术行业、轻工行业等),本文也查询并依据相关目录将这些审批事项一一对应至其所涉及的四位数行业。

(3)计算各行业每年累计取消的审批事项数量。依据各批次文件的颁布时间界定审批事项的取消年份,分别计算各个四位数行业截至某一年累计取消的准入类审批事项数量。

经过上述数据处理,准入类事项涉及的审批环节仅发生在企业进入市场时,因此本文使用企业成立当年取消的准入类审批事项数量度量创业营商环境,可确保其产生的影响源于(且仅源于)企业进入市场时。相比之下,文献中常用的指标是地区成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与否,而由于服务中心带来的制度便利将贯穿企业全生命周期,因此无法区分企业当前受到的影响来源于成立时还是成立后。

(二)实证模型

基于前文的识别策略,本文的实证模型设定具体如下:

$$\text{cloglog}[1 - h_u(j)] = \alpha_0 + \alpha_1 \times \text{deregulation}_i + \gamma_j + \Gamma_a + \Gamma_t + \Lambda_p + \Lambda_r + X\theta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i 代表企业, j 为企业的持续生存时间, t 对应年份。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5年)^②,企业持续生存时间 j 的定义是企业最早出现在数据库中直至退出所经历的时间。其中,企业退出的定义方式借鉴许家云和毛其淋(2016)的研究,将在 t 年出现而之后各个年份均未再出现的企业视为 t 年退出的企业。被解释变量 $\text{cloglog}[1 - h_u(j)]$ 取值越大,意味着企业的退出风险越高。

核心解释变量 deregulation_i 为企业在成立当年所属的四位数行业累计取消准入类审批事项的数量。 γ_j 为企业 i 存活至 t 年,累计存活 j 个时期所对应的基准风险,本文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加以控制。除了为区分出长期影响而控制的年龄固定效应 Γ_a 和年份固定效应 Γ_t 外,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 Λ_p 和地区固定效应 Λ_r 。此外,为避免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变更行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剔除了四位数行业发生过变化的企业样本。

X 为其他控制变量的向量。^③参照卞元超和白俊红(2021)、胡秋阳和李文芳(2023)的方法,宏观环境特征方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企业特征方面,包括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杠杆率、企业出口、盈利能力、生产率、政府补贴。

本文并不直接引入以上所有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由于企业成立后的其他特征也可能受到创业营商环境的长期影响,此时控制这些企业特征将干扰对长期效应的识别。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仅控制企业成立后基本不变的特征,即所有制类型,后续再进一步引入其他企业特征控制变量。

① 限于篇幅,涉企审批事项的范围、经营类审批事项的定义和范围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

② 限于篇幅,数据库清洗、关键指标估算等具体处理步骤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

③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及后文中其他指标的计算方式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

(三)描述性统计

从行业层面来看,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所涉及的482个四位数制造业行业中,有142个行业取消过准入类审批事项,其中64个行业取消过1项以上准入类审批事项,部分行业取消了最多10项准入类审批事项。从企业层面的描述性统计^①来看,在观测期内,针对四位数制造业行业累计取消的准入类审批事项平均为0.27项。从是否有审批事项取消的二值虚拟变量($deregulation > 0$)来看,观测期内有17%的企业在成立当年有准入类审批事项取消。

(四)企业生存特征

在生存分析中,通常使用Kaplan-Meier乘积限估计式和相应的生存曲线初步刻画企业的生存特征。图3呈现了企业成立前或成立当年有过准入类审批事项取消($deregulation > 0$)和截至企业成立时均没有取消过准入类审批事项($deregulation = 0$)的Kaplan-Meier企业生存曲线。可以看出,企业生存率随持续生存时间的增加而降低。当企业持续生存时间小于2年时,“ $deregulation > 0$ ”对应的企业生存曲线短暂位于略低的位置;而随着企业持续生存时间的增加,“ $deregulation > 0$ ”对应的企业生存曲线持续位于更高的位置,且与“ $deregulation = 0$ ”对应的企业生存曲线差距越来越大。这表明减少企业成立时的准入类审批将使得企业的长期生存能力更强,该生存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越来越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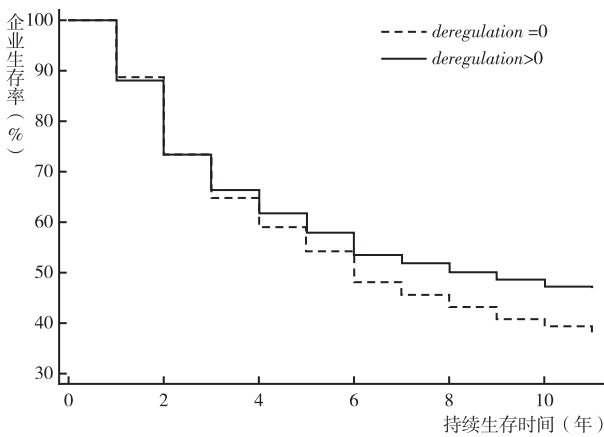


图3 Kaplan-Meier企业生存曲线

五、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表1为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基于式(4)进行回归,控制宏观环境特征、企业所有制类型以及企业年龄、年份、地区、行业四种固定效应。 $deregulation$ 的系数为-0.046,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表明企业成立时减少的准入类审批越多,企业后续的退出风险越低。

① 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

表 1

基准回归

变量	cloglog 模型	cloglog 模型	cloglog 模型	probit 模型	logit 模型	cloglog 模型
	(1)	(2)	(3)	(4)	(5)	(6)
<i>deregulation</i>	-0.046*** (0.007)	-0.045*** (0.008)	-0.115*** (0.029)	-0.028*** (0.005)	-0.052*** (0.008)	-0.063*** (0.009)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520826	1180273	256162	1520826	1520826	1110101
对数似然值	-624139	-491352	-98815	-629315	-626605	-385973

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在行业-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各列回归均控制了宏观环境特征、所有制类型以及企业年龄、年份、地区、行业四种固定效应。下同。第(6)列进一步控制了企业成立后的特征。限于篇幅，包含控制变量的完整回归结果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

第(2)列考虑企业同时布局多个行业的问题。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部分企业同时拥有多个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若这些产品和业务分属不同的行业类别，则单一的四位数行业代码难以刻画这些企业完整的行业信息，即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难以与企业数据准确对应。为排除这一干扰，第(2)列剔除了拥有1个以上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的企业观测值进行回归。

第(3)列改变对企业生存时间起点的定义。本文主要以企业在数据库中出现的时间为起点定义企业生存时间，这一做法与现有文献(毛其淋、盛斌,2013;胡秋阳、李文芳,2023)一致，也是生存分析中定义持续生存时间的标准方法(Esteve-Pérez等,2013)。然而，大部分企业在成立当年并未进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①，这使得本文关注的“企业生存时间”与通常以企业注册或成立为起点定义的“企业寿命”有所区别。表1第(3)列筛选出成立当年就进入数据库的企业进行分析，此时上述两个概念实现了统一，结果表明降低企业准入门槛，无论是对企业持续生存还是企业寿命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4)列和第(5)列分别使用不同的生存模型形式进行类似的回归。通过假定企业生存的时间风险率 h 服从极值分布，本文对企业生存风险的估计对应cloglog模型。而当假定该风险率服从正态分布和logistic分布时，上述估计分别对应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第(4)列和第(5)列分别使用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进行估计，结论依然成立。

第(6)列改变控制变量。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仅控制企业自成立起基本不变的所有制类型作为企业层面的特征。尽管企业当前的规模、盈利能力等均已在众多文献中被验证为影响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企业动态演化理论，由不同创业环境形成的生产率或规模差异将持续、长期存在，进而影响企业其他方面的行为和特征。换言之，创业营商环境可能会作为深层次的原因而对企业的诸多重要特征产生直接或间接的长期影响，此时将这些企业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并不恰当。基于更多现有经验分析的发现，为避免遗漏重要变量对本文的结果产生影响，第(6)列的回归进一步控制企业成立后的其他特征。本文的基本结论不变，且各个企业特征变量的系数符号与现有文献(许家云、毛其淋,2016)完全一致。

^① 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部分企业成立后可能并未立即开始生产经营活动；二是部分企业在成立之初可能暂未达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规模门槛。

(二)稳健性检验

1. 稳健度量企业退出

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生存分析可能面临的问题是,数据库仅包含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2011年以前的标准为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2011年及以后的标准为销售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非国有企业,在某些情形下,企业退出数据库可能仅仅是由于当年的销售收入低于该门槛值,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退出市场。为避免数据库统计原因对本文结论的影响,表2讨论几种情形下,对企业退出更为稳健的度量方式。

表2 稳健度量企业退出

变量	(1)	(2)	(3)	(4)
<i>deregulation</i>	-0.033*** (0.009)	-0.061*** (0.008)	-0.031*** (0.008)	-0.050*** (0.007)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821657	1036344	1376403	1244998
对数似然值	-332409	-491970	-254923	-489820

第(1)列排除数据库规模门槛变化的影响。由于2011年后进入数据库的规模门槛有所提高,企业因销售收入低于该门槛值而退出数据库的概率增加,换言之,2011年前后对企业退出的度量可能存在统计标准不同导致的系统性差异。为此,第(1)列仅保留1998—2010年的企业观测值进行分析,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第(2)列排除生存数据间断带来的影响。部分企业存在重复进入退出数据库的情形(在某一年退出数据库,随后的年份又重新出现在数据库中),造成该企业的生存数据间断。若间断的原因是企业在某一年的销售收入暂时低于数据库门槛值,则如同基准回归中的做法,以最后一次出现在数据库中的时间定义企业退出,并将间断时期视作缺失值,不会对结果造成影响。然而,可能存在部分企业停业后又重新开业的情形,此时企业因停业而退出数据库则应视作企业的一次退出。为避免后者导致的生存数据间断对结果造成影响,第(2)列仅保留自进入到退出一直持续出现在数据库中的企业观测值,*deregulation*的系数仍显著为负。

第(3)列和第(4)列结合其他指标判断企业退出的状态。第(3)列借鉴卞元超和白俊红(2021)的做法,对于非国有企业,仅当其在 t 年处于非营运状态,且在 t 年之后的各个时期均不出现时才视作企业在 t 年退出。基于类似的思路,考虑到销售额接近数据库门槛值的企业更有可能因生产规模波动而退出数据库,实际却并未退出市场,第(4)列仅保留销售额在各个可观测的年份均远高于统计门槛(销售额比门槛值高20%)的企业样本进行分析,结果不变。

2. 稳健度量创业营商环境

表3使用不同的方式度量创业营商环境。第(1)列排除审批事项覆盖范围差异的影响,在所有取消的准入类审批事项中,部分事项是从较细分的行业层面涉及某一四位数行业,而部分事项则是从较大的行业层面,甚至通过行业目录覆盖某一四位数行业,前者影响特定行业中的部分企业,后者则影响该行业中的所有企业。为避免这一区别对结果造成影响,第(1)列使用仅由后一类事项计算得到的准入类审批数量进行分析,基本结论不变。

表3 稳健度量创业营商环境

变量	(1)	(2)	(3)	(4)
<i>deregulation</i>	-0.062*** (0.010)		-0.049*** (0.007)	-0.037*** (0.007)
<i>deregulation</i> >0		-0.156*** (0.016)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520826	1520826	1496295	1520826
对数似然值	-624158	-624034	-613360	-624153

第(2)列使用二值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由于有相当数量的四位数行业自始至终仅取消过1项审批事项,因此第(2)列也尝试使用在企业成立当年“有准入审批事项取消”的二值变量(*deregulation* > 0)进行回归,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且系数绝对值大幅增加。

第(3)列回归仅关注在前三个批次的文件中取消的准入审批事项。2004年7月1日,为了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出台,自此,我国的行政审批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王贤彬、黄亮雄,2020)。以该时间作为划分节点,此前取消的审批事项更接近“随机处理”,此后取消的审批事项则更容易受到政策预期的影响。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也可能导致行政审批的流程和性质发生变化。因此,本文仅使用在前三个批次的文件中取消的准入审批事项计算*deregulation*,并剔除在第四批次及之后的文件中取消的审批事项所涉及的四位数行业样本,结论不变。

第(4)列改变对审批事项取消时间的界定方式。在基准回归中,本文直接以文件颁布年份作为审批事项的取消时间。考虑到部分文件颁布于年底,而文件颁布时间与实际实施时间可能存在差异,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将每年10月及以后颁布的文件统一推迟一年,以界定一项审批事项的取消时间,重新与企业数据匹配后进行回归,结论未受影响。

3. 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

表4进一步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第(1)列排除创业时的行业经济周期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企业成立当年的宏观经济环境会影响企业的长期成长或生存(Geroski和Portugal, 2010;朱奕蒙、徐现祥,2017)。尽管基准回归中的各类固定效应已足以捕捉大部分宏观经济环境的短期或长期影响,但各行业的周期存在较大差异,而企业成立时的行业经济周期也可能产生类似的长期效应。为排除这一干扰,本文基于各个四位数行业的产值,采用H-P滤波法(λ 值取100)计算了企业成立当年所属行业的经济周期,并在第(1)列的回归中加以控制。

表4 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

变量	(1)	(2)	(3)	(4)	(5)
<i>deregulation</i>	-0.046*** (0.008)	-0.053*** (0.008)	-0.037*** (0.007)	-0.041*** (0.007)	-0.023** (0.011)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360794	1272911	1520811	1514098	1520826
对数似然值	-553523	-461344	-620593	-602665	-624133

第(2)列排除行业对外开放进程产生的影响。自2001年起,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几乎同步的是中国加入WTO的进程,各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随着逐步取消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而发生变化。为排除这一影响,本文计算了各个四位数行业每年的平均出口强度和外资企业数量占比,控制上述两个指标后结论未受影响。

第(3)列排除时间趋势的影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涉及企业准入的审批事项不断取消,*deregulation*的数值逐年递增,若恰好特定行业的企业生存能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强,则本文观察到的现象源于共同的时间趋势,而非创业营商环境的影响。为排除这一可能性,第(3)列进一步控制两位数行业的固定效应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结论不变。

第(4)列排除行业随时间变化的其他因素带来的影响。除上述因素外,仍有其他难以观测的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对本文结论产生影响,如产业结构变迁、产业政策调整等。为尽可能排除这些干扰,第(4)列控制了同一个两位数行业中未取消准入类审批事项的四位数行业同年平均的企业退出率,这一设定相当于将各个行业比较的对象限定在同一个行业大类内部,从而排除大部分行业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带来的影响。

第(5)列考虑清理审批事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国务院选择在某个批次的文件中清理一项审批事项也可能是非随机的,若这样的选择恰好是出于对行业当前增长状况或发展前景的考虑,则核心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的问题,本文尝试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这一问题。自1949年以来,中国多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宋世明,2019),在此过程中,大量行政审批事项很可能因其管理部门的撤销、新建或改组而被清理。基于这一逻辑,本文整理了所有审批事项归属的国务院管理部门,以及这些部门的成立时间和撤销(或重组)时间。若在一项准入类审批事项取消前后^①,其管理部门发生过变动,则管理部门变动数量的取值增加1次,本文即以该部门变动数量作为取消准入类审批事项数量的工具变量。第(5)列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核心结论不变。在一阶段回归中,管理部门变动数量与取消审批事项的数量显著正相关,F检验的p值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假设。

六、进一步讨论

(一)异质性分析^②

本文首先考察取消不同细分类型的事项产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通过分别计算开办企业和生产许可相关的审批事项累计取消的数量,并同时引入回归方程,本文发现减少开办企业相关的审批事项对企业生存没有明显影响,而减少生产许可相关的审批事项将显著提升企业的长期生存能力。由于在我国实行“证照分离”改革前,市场上普遍存在“准入不准营”的现象,此时上述两种类型的准入门槛存在区别:开办企业通常是从市场主体的意义上进入市场,而获得生产许可才是从实际生产经营的意义上(经济学意义上)进入市场。该结果意味着降低企业从事生产活动的准入门槛才是提升企业长期生存能力的关键。

其次考虑企业年龄的异质性。通过引入*deregulation*与企业年龄对数的交互项,本文发现在企业成立之初,减少准入类审批对企业生存的短期影响并不明显,但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在较低的

^① 该时间窗口期为审批事项取消前3年以内,或取消后1年以内。前者表示一项审批事项可能在其管理部门变动后的3年内被取消,后者表示审批事项可能在其管理部门即将变动的前步被取消。

^② 限于篇幅,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

准入门槛下成立的企业逐渐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生存能力。这与前文由 Kaplan-Meier 企业生存曲线揭示的规律一致,即长期来看,减少准入类审批对企业生存的正向影响越来越明显。

再次考察创业营商环境与创业经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通过引入企业成立当年的行业经济周期及其与 *deregulation* 的交互项,本文发现行业衰退时期成立的企业生存能力更强,符合文献中经济衰退的创业环境具有“选择效应”的观点(朱奕蒙、徐现祥,2017)。进一步,当企业成立当年的行业经济环境处于衰退期时,减少准入审批对企业生存的长期促进作用更明显,即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经济衰退这两种正向影响企业长期生存的创业环境之间存在互补性。

最后考察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有两种维度的改革同步推进:一是在行业层面取消审批事项;二是在地区层面成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前者由国务院统筹实施,彰显改革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后者由各地区自发推动,体现地区改革的主动性。两种改革的作用既可能协同互补,也可能相互替代。本文引入企业成立当年所在地区是否成立了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二值虚拟变量及其与 *deregulation* 的交互项。结果表明,成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与减少准入审批的作用类似,都能显著提升企业的长期生存能力,而二者的作用存在替代性,当一个地区没有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时,减少准入审批对企业生存能力的提升效果更明显。这一结果也意味着当地地区缺乏改革的主动性时,自上而下的强制改革将产生更明显的影响。

(二)产业链溢出效应

本文所关注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行业层面的政策冲击,由于产业链上下游的行业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互动,因此行业层面的政策冲击极有可能存在外溢效应。为检验这一可能性,本文参照包群等(2015)的方法,基于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上下游行业取消准入类审批事项数量的加权指标,引入基准回归模型。^①实证结果表明,上下游行业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均存在外溢效应。在企业成立当年,上游或下游行业取消准入类审批事项均会对本行业企业的长期生存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当减少准入类审批降低了企业的进入成本时,既可能通过“市场选择”效应提高新企业的初始和长期生产率,进而对企业生存产生正向影响,也可能通过“企业选择”效应缩小新企业的初始和长期规模,进而对企业生存产生负向影响。本文的结论符合“市场选择”观点,减少准入类审批对企业长期生存产生了正向影响。根据该观点,进入成本下降将提高企业进入退出的临界生产率,从而筛选出生生产率更高的新企业进入市场,且该生产率优势往往具有持续性。而初始或当前生产率越高的企业生存能力越强,因此在较低的进入门槛下诞生的企业长期生存能力更强。

为了验证以上机制,本文针对上述两种竞争性的观点,考察创业营商环境对企业初始特征的影响。基于回归方程(5),表5第(1)至(3)列仅保留企业成立当年的观测值,分析企业的初始特征。

$$Y_{it} = \beta_0 + \beta_1 \times deregulation_i + \Gamma_t + \Lambda_p + \Lambda_r + X\theta + \varepsilon_{it} \quad (5)$$

其中, i 代表企业, t 代表年份, Γ_t 、 Λ_p 、 Λ_r 分别代表年份、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控制变量与式(4)相同(其中企业特征仅控制所有制类型)。

^① 限于篇幅,加权指标的计算方式和溢出效应的回归结果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

表 5 机制检验

变量	ln_asset	ln_output	tfp	tfp_cutoff	tfp_cutoff	tfp
	(1)	(2)	(3)	(4)	(5)	(6)
deregulation	-0.029 (0.024)	0.008 (0.020)	0.039* (0.020)	0.046*** (0.017)	0.040* (0.022)	0.019*** (0.005)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62745	54440	47662	5627	5651	1257016
R ²	0.317	0.408	0.228	0.648	0.541	0.225

第(1)列和第(2)列以企业的初始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表明,无论使用总资产(ln_asset)还是实际工业产值(ln_output)度量企业规模,减少准入审批对企业初始规模均没有影响,即不存在“企业选择”效应。第(3)列以企业的初始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此时deregulation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减少准入审批后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初始生产率,从企业初始特征的角度验证了“市场选择”效应的存在。

本文进一步从市场均衡的角度验证“市场选择”效应,即减少准入审批提高了企业进入退出的临界生产率。本文计算了每年各个四位数行业中生产率较低的3家在位企业和生产率较高的3家退出企业的生产率均值,作为临界生产率(tfp_cutoff),基于式(6)进行回归分析。

$$tfp_cutoff_{pt} = \gamma_0 + \gamma_1 \times deregulation_{pt} + \Gamma_t + \Lambda_p + Z\theta + \varepsilon_{pt} \tag{6}$$

其中,p代表行业,t代表年份,Γ_t、Λ_p分别为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控制变量Z包括该行业当年的国有企业数量占比、外资企业数量占比和企业平均年龄。

第(4)列中deregulation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从市场均衡的角度看,减少准入审批也提高了企业进入退出的临界生产率。

第(5)列借鉴Costa等(2019)的思路,使用RO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方法讨论生产率临界值的变化。该方法在医药领域应用广泛,近年来也出现在经济学研究中(洪俊杰、张宸妍,2020)。本文将企业当年是否退出作为状态变量,企业生产率作为检验变量,ROC分析通过最大化式(7)寻找区分企业退出状态的最佳临界点。

$$\widehat{tfp_cutoff} = w \times sensitivity - (1 - w) \times (1 - specificity) \tag{7}$$

其中,sensitivity(灵敏度)为正确识别退出企业的概率,specificity(特指率)为正确识别非退出企业(即在位企业)的概率,w为平衡两种正确率的权重。当假定w = 0.5时,式(7)即Youden’s J统计量,通过最大化该统计量确定企业退出对应的临界生产率(tfp_cutoff),代入式(6)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同样表明,减少准入审批能够提高市场的临界生产率。

第(6)列验证企业生产率优势的持续性。在回归方程(5)的基础上,本文以企业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保留企业成立后各个年龄的观测值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控制了企业年龄固定效应Γ_a。该方程设定用于识别长期效应的原理与式(4)类似,此时系数β₁能够识别出企业成立当年的准入审批数量变化对企业生产率的长期影响。结果表明,减少准入审批将显著提升企业的长期生产率,经由创业营商环境形成的生产率优势将持续存在。

七、结论与启示

在营商环境建设过程中,随着市场准入门槛的不断下降,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长,新进入企业的存活时间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与现有文献的发现相符,更多新企业在成立之初便迅速退出市场;另一方面,长期存活的企业相对比重也在大幅提升,这一现象并不符合直觉。为此,本文立足我国当前保持经济韧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现实需求,考察创业营商环境对企业长期生存的影响。

基于企业动态演化理论,本文将取消准入审批看作进入成本下降,“市场选择”和“企业选择”观点为长期影响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基础。实证分析的结果支持“市场选择”观点,本文发现企业成立时累计取消的准入类审批事项数量越多,企业的长期生存能力越强。进一步,创业营商环境的长期影响主要来源于减少生产许可类审批,影响程度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且在不同的创业经济环境和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此外,该长期影响在产业链的上下游行业之间存在溢出效应。最后,本文发现减少准入审批提高了新企业的初始生产率和市场均衡的临界生产率,并且该生产率优势具有持续性,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机制。

本文的研究发现是稳健的,揭示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启示。第一,“降门槛”改革并未引致低质量企业大量涌入市场,反而催生出众多优质的市场主体,这些新企业已构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本盘,后续营商环境优化应侧重于助力新设市场主体的成长和生存,除了让企业“生”得便利,还要让企业“活”得好,托举市场主体长期健康发展。第二,“降门槛”改革对企业生存的积极影响体现在长期,高质量企业的生产率优势需假以时日方能显现,然而就短期而言,改革后的新设企业在初创阶段往往面临更高的退出风险。因此,“保市场主体”的相关政策应重点关注和扶持初创阶段的企业。当然,为避免产生新的资源扭曲与错配,也需保证政策实施效果监测与评估的常态化,持续推进营商环境调查,精准把握助企纾困政策的时机与力度。第三,创业营商环境的长期影响部分取决于其他外部环境,必须充分认识到“降门槛”改革作为单一政策工具的局限性。随着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骤增,以及营商环境建设重点逐步发生转移与变化,应及时对现存和潜在的营商环境政策工具进行更为全面的梳理与整合,打好政策“组合拳”,确保各项政策形成合力、同向发力。

参考文献:

1. 包群、叶宁华、王艳灵:《外资竞争、产业关联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存活》,《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
2. 毕青苗、陈希路、徐现祥、李书娟:《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进入》,《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
3. 毕青苗、徐现祥、杨海生:《商事制度改革与就业增长》,《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年第1期。
4. 卞元超、白俊红:《市场分割与中国企业的生存困境》,《财贸经济》2021年第1期。
5. 洪俊杰、张宸妍:《产业政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机制和福利效应》,《世界经济》2020年第11期。
6. 胡秋阳、李文芳:《银行内部组织的功能距离与危机冲击下的中小企业生存损失——兼论中小型银行优势和现代信息技术》,《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9期。
7. 林超、刘盛宇、尹恒:《营商环境、交易费用与小微企业生存》,《世界经济》2024年第9期。
8. 毛其淋、盛斌:《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入退出与生产率动态演化》,《经济研究》2013年第4期。
9. 宋世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70年回顾与反思》,《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9期。
10. 王永进、冯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2期。
11. 王贤彬、黄亮雄:《投资审批体制改革推动投资增长了吗——来自2004年中央投资审批体制改革的经验证据》,《财贸经

济》2020年第3期。

12.王红建、傅文霁、曹瑜强、李青原：《信息分散程度、审批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市级行政审批中心成立的准自然实验》，《财贸经济》2020年第5期。

13.夏杰长、刘诚：《行政审批改革、交易费用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17年第4期。

14.肖兴志、何文韬、郭晓丹：《能力积累、扩张行为与企业持续生存时间——基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生存研究》，《管理世界》2014年第2期。

15.许家云、毛其淋：《政府补贴、治理环境与中国企业生存》，《世界经济》2016年第2期。

16.朱奕蒙、徐现祥：《创业的宏观环境对企业的长期影响：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世界经济》2017年第12期。

17.朱光顺、张莉、徐现祥：《行政审批改革与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3期。

18.Agarwal, R., & Audretsch, D., Does Start-up Size Matter?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and Product Life-cycle on Firm Surviv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Vol. 49, No. 1, 2001, pp. 21-44.

19.Atkeson, A., Hellwig, C., & Ordonez, G., Optimal Regul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Reputation Concer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30, No. 1, 2015, pp. 415-464.

20.Blanchard, O., & Giavazzi, F.,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in Goods and Labor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8, No. 3, 2003, pp. 879-907.

21.Brandt, L., Johannes, V. B., & Zhang, Y.,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7, No. 2, 2012, pp. 339-351.

22.Branstetter, L., Lima, F., Taylor, L. J., & Venâncio, A., Do Entry Regulations Deter Entrepreneurship and Job Creation? Evidence from Recent Reforms in Portugal. *Economic Journal*, Vol. 124, No. 577, 2014, pp. 805-832.

23.Costa, S., Sallusti, F., Vicarelli, C., & Zurlo, D., Over the Roc Methodology: Productivity, Economic Size and Firms' Export Threshold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27, No. 3, 2019, pp. 955-980.

24.Dunne, T., Roberts, M. J., & Samuelson, L., The Growth and Failure of U. S. Manufacturing Pla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 No. 4, 1989, pp. 671-698.

25.Esteve-Pérez, S., Requena-Silvente, F., & Pallardó-Lopez, V. J., The Duration of Firm-Destination Export Relationships: Evidence from Spain, 1997-2006. *Economic Inquiry*, Vol. 51, No. 1, 2013, pp. 159-180.

26.Geroski, P. A., & Portugal, P., Founding Conditions and the Survival of New Fir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1, No. 5, 2010, pp. 510-529.

27.Gomis, R. M., & Khatiwada, S., Firm Dynamics and Business Cycl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 Working Paper, 2017.

28.Hess, W., & Persson, M., The Duration of Trade Revisited: Continuous-Time vs. Discrete-Time Hazards. *Empirical Economics*, Vol. 43, No. 4, 2012, pp. 1083-1107.

29.Hsieh, C. T., & Klenow, P. J.,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74, No. 4, 2009, pp. 1403-1448.

30.Hopenhayn, H. A., Entry, Exit, and Firm Dynamics in Long Run Equilibrium. *Econometrica*, Vol. 60, No. 5, 1992, pp. 1127-1150.

31.Klapper, L., Laeven, L., & Rajan, R., Entry Regulation as a Barrier to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82, No. 3, 2006, pp. 591-629.

32.Lee, Y., & Mukoyama, T., Entry and Exit of Manufacturing Plants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77, 2015, pp. 20-27.

33.Luttmer, E., Selection, Growth, and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2, No. 3, 2007, pp.1103-1144.

34.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Vol. 71, No.6, 2003, pp. 695-1725.

35.Moreira, S., Firm Dynamics, Persistent Effects of Entry Conditions, and Business Cycles. Working Paper, 2017.

36.Sedlacek, P., & Sterk, V., The Growth Potential of Startups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7, No.10, 2017, pp. 3182-3210.

Entry Business Environment, Entry Barriers and Long-Run Firm Survival

ZHU Yimeng (Foshan University, 528225)

XU Xianxi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275)

Summary: Sinc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as improved in China, there has been a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survival time of entrants as the entry barrier lowers. While more new firms exit shortly after entry,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share of firms surviving long-term has als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is counterintuitive finding raises critical questions about how lower entry barriers affect long-run firm survival—a topic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stabiliz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irm dynamic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bolition of entry approvals as a reduction in entry cost. The “market selection” view and “firm selection” view provide two possible paths of long-run effect with opposite results. Empirical findings support the former. Entry approvals abolished at the establishment of firms increase the long-run survival possibility. Further, the long-run impact of the entry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firm survival mainly comes from the abolition of production licenses. The impact reinforces as firms age.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when firms enter during economic recessions or when local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ervice centers are absent. Finally, this study finds that both the initial productivity of entrants and the equilibrium productivity of market turnover increase after the abolition of entry approvals, with persistent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These findings coincide with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market selection”.

The possibl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shifts the focus of the evalu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firm survival an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reform from short-run to long-run effects, while previous studies mostly focused on the current or short-run effec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reform, with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long-run effects. To overcome challenges of building a suitable measurement and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when exploring the long-run effects, this study precisely measures the entry business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licy texts, which clearly distinguishes from regulations governing other stages in a firm’s lifecycle. Meanwhile, by introducing the APC model into standard survival analysis, this study solves the problem of identifying long-run effects. Second, the study expands the focus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reform from the regional level to the industrial level.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discus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ervice centers at the regional level, with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abolition of approvals at the industrial level. This paper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policy change more comprehensively. Third,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which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entry economic environment, such as business cycle and credit condition, in attempts to identify deep-rooted factors for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ntry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xpands the study of firm dynamics from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to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Keywords: Entry Business Environment, Entry Approvals, Firm Survival, Firm Dynamics

JEL: D22, M13, O25

责任编辑: 非同